

摘要

K 他命自 2006 年起蔚為潮流，成為年輕族群偏好使用的娛樂性藥物。除了社會中對管制藥物既存的負面認知，青少年用藥行為也引發許多爭議討論，包括使用藥物是否導致生產力下降、用藥是否會危害他人安全、將過量使用藥物者視為犯人是否恰當，以及次文化無涉政治反叛，單純為了享樂放鬆的觀點。在各方論述的競逐下，媒體如何報導這些新聞卻鮮少有研究關注。本研究旨在探討媒體如何建構青少年用藥議題，以哪些主題為多？是否與特定時期有關？凸顯了哪些人的觀點？使用 K 他命的青少年被框架為何種樣貌？是否與主題、消息來源有關？又是否因媒體差異而有不同？新聞文本的再現反映出隱含在社會文化中如何看待青少年用藥的價值觀？

為解答上述問題，本研究採取量化內容分析與兼具質量性的框架分析二部分，分析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的青少年使用 K 他命新聞，總共 304 則。

在量化內容分析部分發現，青少年使用 K 他命新聞以「純淨新聞」寫作形式最多，最常出現在「社會/焦點」版面，最主要的新聞主題為「犯罪案件」，引用比例最高的消息來源為「檢警調實作人員」。本研究也依報導數量分布的多寡，將新聞區分為二種時期：派對檔期與平時。在派對檔期，「春浪/春吶音樂節」、「用 K 的新奇方式」主題顯著較多；在平時，媒體則偏重「犯罪案件」主題。

在內容分析的框架類別部分，本研究發現新聞主角最多被再現為「受害者」和「標新立異的逸樂者」，「加害他人的罪犯」次之，「過量使用的病人」和「初次使用的好奇者」框架所占比例偏低。特別的是，在隸屬「初次使用的好奇者」新聞中，最優先消息來源為「政府單位/官員/政治人物」，代表媒體在看待年輕的 K 他命使用者時，也傾向採用政府單位的預防禁止觀點。主角框架因媒體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蘋果日報》最多再現用 K 青少年為「標新立異的逸樂者」，《聯合

報》則凸出用 K 青少年的「受害者」樣貌。

在質化框架論述分析部分，整體來說，用 K 青少年形象以負面居多，在「標新立異的逸樂者」、「加害他人的罪犯」以及「初次使用的好奇者」框架中，論述皆呈現譴責意義，透過斥責或訝異用藥者的失序行爲，甚至危害他人的作爲，來指出 K 他命藥效是造成犯罪的原因。用 K 青少年被再現爲「標新立異的逸樂者」比例偏高，在此類範本中若涉及春浪/春吶音樂節主題，「轟趴」、「搖頭」、「嗑藥」、「藥頭」等負面隱喻不斷出現且相互扣連，將問題責任歸諸青少年集體，雖然實際上用 K 玩樂可能是某部分人的作爲，但此種描述法卻無形污名化所有參與活動的青少年，也加深墾丁音樂節與「毒」連結的既定印象。

媒體高度依賴警方對青少年用藥現象的詮釋觀點，而用藥青少年被再現爲社會正規秩序的破壞者，當其作爲次要引述來源時，較多是坦承犯刑或否認，兩相對照下，善惡對立的劇本凸顯出年輕用 K 者的負面形象。此外，新聞論述除了鋪敘移送法辦、建議將 K 他命改列二級毒品管制等處理方式，傳統倫常規範也透過家長的痛心呼籲帶進此議題的價值詮釋上，顯示出藥物使用的適當與否，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依然被定位成犯罪問題和道德瑕疵，故心理治療觀點與次文化聲音被報導的比例不高。

媒體納入精神醫學觀點，看待用藥者爲「過量使用的病人」比例偏低，也極少提及持續使用 K 他命產生的主要問題其實在於心理層面對藥物的依賴。即便彰顯前述看法，文本中出現的專家也單純只有臨床醫生和精神科醫師，未見其他輔導協助人員的角色，後續配套措施資訊介紹也仍不夠充足，青少年使用 K 他命行爲在此論述鋪敘中，被建構成不必導入心理諮詢及家庭輔導的問題。

用 K 青少年被再現爲「受害者」的比例最高，並可細分爲「被人利用的中介」和「無知的女性弱者」二種範本。前者的新聞主角因無知被藥頭或販毒集團利用才進行販運製毒等犯法行爲，且文本中多半形容其深具悔意的態度，因此得

到較正面的詮釋和同情憐憫。至於女性誤用 K 他命遭致身心損害，卻因其態度不夠堅定而必須替後果負上部份責任，性別意識型態超越了管制藥物是單一導因的認知，亦可見污名女性的端倪。

最後，透過分析結果，本研究希望能提供後續傳播研究對青少年娛樂性用藥、過量用藥等議題的重視，並建議媒體工作者深化本身知識，納入多元視角，在報導中區辨 K 他命和其他管制藥物（如海洛因、安非他命、搖頭丸）的藥效差異，並依情境、處遇、使用者個人區分使用藥物的程度，如此才能傳達較多方資訊，並建立大眾的藥物知識和健康素養。政府面對青少年用藥行為，除了現行的控管方式外，可再參考荷蘭藥物政策中的「減害」思維，來重新審思我國藥物政策的實際有效性。

關鍵字：K 他命、內容分析、框架分析、新聞再現

